

唯物史观

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高惠珠◎执行主编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与创新理念

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协调理念

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与绿色理念

世界历史理论与开放理念

群众史观与共享理念

意识形态理论与新发展理念

唯物史观新视野与 新发展理念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唯物
史观

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高惠珠◎执行主编



唯物史观新视野与 新发展理念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唯物史观新视野与新发展理念研究/上海市哲学学会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808-5

I. ①唯… II. ①上… III. ①历史唯物主义-研究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B03②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66859 号

责任编辑 赵 伟

封面设计 范昊如 夏 雪

唯物史观新视野与新发展理念研究

上海市哲学学会 编 高慧珠 执行主编

出 版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发 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20×1000 1/16
印 张 18.75
插 页 2
字 数 318,000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5808-5/D·3397
定 价 68.00 元

编 委 会

主 任:吴晓明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天恩 吕会霖 许宏海 吴晓明

吴德勤 李家珉 胡振平 贺善侃

高惠珠(女) 黄力之

序

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践基础

李线明

“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创新”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主题。在这个主题中，一方面是现实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是思想理论的创新。就两者的关系而言，中国自近代以来的发展道路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创新的实践基础。为了从客观方面阐释主题，需要深入地理解和把握这一实践基础——“中国道路”。

近代以来的中国，既积贫积弱，又处于“世界历史”的格局中，因而其最基本的诉求就是赢得一个现代发展，以期能够在诸强环伺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个现代化诉求是以历史的现实基础为根据的，因而它确实在中国整个近代史的展开过程中表现为必然性。近代以来的中国道路，亦即中华民族的强盛之路、复兴之路，首先是从这种现代化诉求发源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般的现代化目标构成中国道路之初始的和基本的规定。

然而，中国的现代化要求却并不是从其传统社会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而是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外部势力的冲击和胁迫。因此，为了使得现代化诉求在中国历史地成为可能，必须经历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这意味着：除非经由彻底的社会改造来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开辟道路，并使之获得决定性的奠基，否则这一事业就是不可能的。在尝试了种种探索并经历了繁复艰难的斗争之后，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道路的社会革命最终采取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定向。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任务的全面展开，在其社会层面上不可避免地通过社会主义定向的革命来实现。费正清很正确地看到了这种必然性，他在《伟大的中国革命》一著中写道：20世纪初杜威访华时曾对他的学生胡适说，军阀和现代教育不可能并行不悖；而我们的结论是，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中国革命也不可能并行不悖。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某些肤浅的观点总是抽象任意地“假设历史”，并以极为轻佻的方式来否定近代中国之历史性实践的客观性。例如有人说国民党的失败仅仅是军事失败，亦即一种纯粹偶然的失败；殊不知

在这种失败背后的乃是政治失败,尤其是在社会中的失败。要言之,必须从社会现实的方面去把握中国道路的历史性本质:中国的现代发展只有通过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才能获得其客观的基础;正是由于这一基础本身,社会主义的定向乃历史地成为其现代化发展道路的基本规定。

由于这一基本规定,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革命,从而对于中国现代化的客观奠基来说,成为意义重大的和绝对必要的。中国近代以来历史性实践的展开,以及在这种展开过程中所形成的客观需要,将马克思主义本质重要地纳入中国道路的实际进程之中。如果没有这种客观需要,则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而言,就不存在关乎本质的重要性,或许只是可供主观择取或学院研究的诸社会思潮之一种罢了。然而,正因为这种客观需要深刻地植根于近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所以在理论与实践彼此制约也彼此增益的进程中,中国道路的现实展开在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引领之际,也使马克思主义深刻地中国化了。由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思考中国道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并通过这种关系来说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实践源头。

第一,作为一种历史性实践,中国道路构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基础和强大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近代以来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虽然有着重要的社会根源,但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首先是作为一种理论被学习、传播和掌握的。在初始阶段,即使是以中国革命的实践意图来诉诸马克思主义,这一理论也还往往以较为抽象的形式与实践本身保持着距离;这就导致了对理论的主观运用,并以此来遮蔽或强制现实。这种主观主义在哲学上叫做“外部反思”——它作为忽此忽彼的推理能力,从来不深入到现实本身的内容中去;但它知道一般原则,并且知道把一般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黑格尔曾说过,当年拿破仑想把法国的自由制度先验地强加给西班牙人,但结果是够糟糕的。与此相类似,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想把一般原则先验地强加给中国革命,结果也是够糟糕的——不只是糟糕,而且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于是,历史性实践在其展开过程中要求废止仅仅停留在抽象原则上的外部反思,换言之,正是中国道路本身构成对这种教条主义的实践批判。这样的实践批判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深入到中国的社会现实中去,必须在这种深入中牢牢地把握中国社会的实体性内容,从而成为本身为中国道路所规定、同时又积极地开启中国道路的思想理论。因此,正是作为历史性实践的中国道路从根本上要求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从

而开辟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历程。由此可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不仅如此,它还同一切形式的外部反思相对立。在今天的知识界,仅仅知道把抽象原则运用到任何内容之上的外部反思依然盛行,只是今天的教条大多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西方罢了。

第二,中国道路的实践展开,构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源头活水。从根本上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一种创新,而且是一种意义深远的和纲领性的创新,它在中国道路的展开过程中对各个阶段或各个方面的理论创新起根本的定向作用。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要他不是停留于抽象的原理或教条,只要他试图使马克思主义经由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深刻地具体化,只要他将这种具体化不断整合到中国道路的实践进程之中,他的工作就不能不是创造性的。例如,当教条主义者根据一般原则和俄国经验而认定中国革命只能以“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方式来实现时,“农村包围城市”的原理就是一种真正的创新。这一原理从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而来,它尤其是从中国的社会现实而来,从对这一现实之内容的透彻分析和深入把握而来。同样,当传统的观念认定市场经济仅仅归属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因而为社会主义制度所完全拒斥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原理就是一种真正的创新。就像这一原理把社会主义的实质把握为特定条件下的生产力解放和共同富裕一样,它把中国的发展道路决定性地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事实上,在中国道路的每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上,这样的创新到处都在实质地发生。如果我们把上述原理看成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那么毫无疑问,它们同样是以中国道路的创新性实践为基础,并以这样的实践为归宿的。

第三,中国道路向着未来的展开与筹划,要求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有更加重大的创新,这种创新将积极地指向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当今的中国道路也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它既没有先例也没有现成的样式;它固然具有现代化的一般规定,但它的现代化任务是在与西方完全不同的社会条件和文化传统的基地上展开的,而且这一任务还具有突出的社会主义定向。这意味着中国道路的历史性实践所开展出来的现代发展,既必须经受“文化结合”的锻炼,又不可能被完全封闭在现代性的范围之内。就前者而言,中国的发展要求使它的传统和外来的现代要素整合起来,要求在广泛的对外学习中形成自己坚定的自我主张。黑格尔曾说,古代希腊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经历了文化结合的艰苦锻炼,从而产生其正当的活力,并开展出它的繁盛时代。就后者而言,中国的现代化固然要求进入到现代性即现代世界的本

质根据中,但无论是资本的原则还是现代形而上学的原则都无法真正牢笼中国发展的现实道路,就像中国人不可能变成黄皮肤黑头发的美国人一样。更加重要的是,正是在中国近期的快速发展中,现代性本身的历史限度——无论是自然的限度还是社会生活的限度——已急剧临近了。因此,中国道路的未来既不可能从单纯的传统中,也不可能从诸多的外来物中发现自己的最终依据,甚至不可能从一般所谓现代性中找到自己的归宿。从上述不可能性中产生出来的实践可能性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唯依赖于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就此而言,如果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本质重要地参与并引领着中国道路的现实展开,而中国道路又始终以其强大的实践力量不断推进着理论创新,那么可以说,中国道路向着未来的开拓已将更加重大的创新任务托付给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了。

《唯物史观新视野与新发展理念研究》一书是由上海市哲学学会的一批学者、专家完成的研究项目,由高惠珠、李家珉两位教授牵头,项目得到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资助。这一项目的研究,正是试图在中国道路的实践基础上,来探讨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特别是来阐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因此,这本书的基本主旨是:通过唯物史观来把握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同时又通过概括当代中国发展的新理念来开拓唯物史观的新视野。我们深知:唯物史观只有始终与现实的历史进程相联系才能具有真理性和生命力,同样,现实的历史进程只有在唯物史观的视野中才能得到正确而深刻的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正在生机勃勃地开展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这种发展理念固然和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现代化任务相联系,并且要求占有现代文明的积极成果,但却并不局限于现代性的范围之内;毋宁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在于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而且在于开启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当今中国的发展理念是通过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来获得基本规定的。这样的发展理念需要通过唯物史观来加以深入的理解和分析,而唯物史观的视野同样也通过这样的发展理念而得到积极的拓展和推进。如果说这正意味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创新,那么,我们的这项研究就是试图对这样的创新成果作出某种探讨性的考察和阐述。

目 录

序 中国道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的实践基础	1
导论	1
一、新发展理念和中国梦	2
(一) 在历史中觉醒	2
(二) 艰难的探索	4
(三)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	8
二、新发展理念和唯物史观新视野	10
(一) 唯物史观的再认识	10
(二) 唯物史观的深刻体现	14
(三) 对唯物史观的新贡献	17
三、在新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发展中国	22
(一) 社会发展的重要环节	22
(二) 受动能动和自在自为	25
(三) 把新发展理念化为方法和制度	29
第一章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与创新理念	33
第一节 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沿革及基本内涵	33
一、马克思以前的社会发展动力思想	34
二、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建立	38
三、唯物史观社会发展动力理论的发展	46
第二节 当代社会的发展需以创新为动力	53
一、创新与社会发展	53
二、创新：新时代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	58
三、作为新发展理念的“创新”	62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创新理念的现实路径	67

一、以解放创造力为核心的践行创新理念根本路径	68
二、以创客文化建设为突破口的文化革新路径	72
三、以政府转型为契机的体制改革路径	77
第二章 社会有机体理论与协调理念	82
第一节 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沿革及基本内涵	82
一、社会有机体理论的提出	82
二、马克思的社会有机体理论	87
三、社会有机体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93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协调理念的引领	96
一、坚定不移的道路目标需要政治“协调”	97
二、“发展”和“共享”的逐步实现需要经济“协调”	99
三、思想活跃与价值认同需要文化“协调”	103
四、和谐有序的实现和维护需要社会“协调”	105
五、建设绿色家园需要生态“协调”	107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协调理念的现实路径	110
一、法治是“协调”的底线与保障	110
二、机构组织是“协调”的推力与总揽	112
三、思想工作“协调”的常态化基本功	114
四、媒体是“协调”的染色剂、增强剂与快捷工具	115
第三章 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与绿色理念	118
第一节 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沿革及基本内涵	118
一、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朴素理念	118
二、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	120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思想	124
第二节 当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以绿色为标准	132
一、人类改造自然活动的两重性	132
二、人类正面临着生态环境退化的严峻挑战	135
三、从黑色发展到绿色发展:社会文明形态的转型	140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绿色理念的现实路径	146
一、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	146
二、制定绿色发展战略,建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	150

三、形成绿色发展大格局	155
第四章 世界历史理论与开放理念	159
第一节 世界历史理论的沿革及其逻辑展开	159
一、马克思以前的世界历史理论	159
二、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形成	163
三、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逻辑展开——全球化与开放	168
第二节 当代社会发展要求须以开放为引领	172
一、西方国家的发展与开放	172
二、当代中国特色的改革开放之路	177
三、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开放	183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开放理念的现实路径	191
一、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开放	191
二、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开放	198
三、从经济到文化的开放	206
第五章 群众史观与共享理念	218
第一节 群众史观理论的基本内涵	219
一、唯物史观视野中的人民群众	219
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中的作用	221
第二节 当代社会的发展需以共享为目标	225
一、“共享”是新时代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	225
二、对群众史观缺失与发展模式片面性的反思	232
三、“共享”理念引领“以人为本”的发展模式	236
第三节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引领共享问题的进一步解决	239
一、“以人民为中心”:唯物史观新视野与治国理政核心理念	239
二、深入认识实现“共享”的政治保证	241
三、落实共享:从顶层设计到“最后一公里”	245
第六章 意识形态理论与新发展理念	250
第一节 意识形态理论的沿革及其基本内涵	250
一、意识形态概念的源起	251
二、意识形态理论的沿革	251

三、唯物史观新视野中的意识形态理论	258
第二节 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与新理念	263
一、主流意识形态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	263
二、新发展理念和主流意识形态建设	269
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现实境遇及建设方略	275
第三节 践行新理念,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279
一、新发展理念的传播与认同	279
二、以意识形态工作的“六种意识”推进新发展理念的践行	281
三、在新发展理念引领下,开创治国理政新局面	284
后记	288

导 论

2018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改革开放是中国进入新时期的起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国各领域均取得了全面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新时代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巨大贡献的时代。

新时代的来临,是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思路之变、结构之变、动力之变分不开的。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战性时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习近平总书记在开始起草时就强调:“首先要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发展理念搞清楚,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①显然,新发展理念是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经验和教训实践经验的体悟和总结。这自然激起了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我们哲学工作者极大地理论兴趣与研究愿望,即切入中国现实,使理论研究始终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进程同步相随,在回应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新问题以及回答当代中国重大的理论与现实问题中,显示自身的存在,作出自身的贡献。本书的各章,都反映出这一理论研究的特点及作者们的这一理论追求,大家认为新发展理念,自己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197 页。

各担其责,相互区别又共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以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及其逻辑为前提,以构建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客观前景为基础定向,真正体现了它的世界历史性意义。

一、 新发展理念和中国梦

新发展理念的提出是为着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先进分子一直为之奋斗的理想——中国梦;中国梦的理想蓝图,又在新发展理念中大致体现出来。理念和目标有着内在的关联,而它们又都是在艰巨的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的。

(一) 在历史中觉醒

一百多年来,在外国列强的侵略压迫下,中国的先进分子和广大民众有一个从浑浑噩噩到逐步清醒的过程。目标的确定和道路的选择是其从自在到自觉的体现。而潜伏在目标和道路背后的,则是人们对于民族危亡问题的认识和所形成的观念。日益加剧的亡国灭种危险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起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然而探索的道路却是异常地曲折,一次又一次地探索实践,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逼得中国人一次又一次地变换着目标更新着手段,从早期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洋务运动”,到学习西方的制度“戊戌变法”搞新政,到深入下去搞新文化运动,乃至进行国民革命推翻帝制等等,无不反映着人们认识的不断深化,理念的不断更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这样经历了从近代、现代到当代的长期探索过程。离开了这个历史过程,我们就难以理解中国梦这个伟大的奋斗目标,也难以理解当今我们提出的新发展理念。

从世界历史来看,西方资本主义的迅速崛起迫切需要打开世界市场,伴随着商品和资本的输出不仅有大批传教士,而且有军舰和大炮。野蛮的侵略和征服是打开世界市场的有力武器。这就是近代殖民主义兴盛的根本原因。中国近代史上的灾难也是由此引起的。然而与一般的落后国家不同,中国是个屹立于亚洲东部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明清之前其经济文化乃至科技政治长期据于世界之首,虽然也曾多次战乱分裂或被外族统治,但大一统的格局基本没变,底蕴深厚的中华文明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冲突和交融中汲取了其他民族的长处,壮大了自己,形成了独特的以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组成了中华民族的大家庭。可是当中国还陶醉于天朝之国,得意于康乾盛世的时候,西方国家却正在经历着伟大的革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和资产阶

级革命的成功极大地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工业革命更使得它们迅速走上机械化大生产的道路。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而当西方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时候,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表现出惊人的麻木和极度的愚昧:妄自尊大、拒绝开放,囿于传统、反对变革,满足现状、固步自封,特别是限制工商业、蔑视科学技术、闭关锁国、加强集权、禁锢思想的做法,愈加严重地制约着社会的进步”^②。1984年,邓小平在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③就这样,古老的曾经十分强大的中华文明衰退了,第一次遇到了新兴的比自己强大的但却十分野蛮的西方文明。在这两大文明板块的冲撞中,中国的连连失败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因为对手的强大,更因为自身的落后和腐朽;但是在强大的对手面前能否重新站立起来,固然与中国是个有着古老文明的大国有关,更取决于中国人自身的觉醒以及对于社会的改造。

国人的觉醒十分痛苦而漫长。首先是要睁开眼睛看世界,要认识到自己并非想象中的天朝大国,要承认人家在许多地方比我们强。与此同时,要进一步认识到自己的问题所在,找到一条可行的救国救民道路,形成自己奋斗的目标。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1年辛亥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对落后原因的认识逐步由器物到制度到文化,对变革的手段的认识由改良到革命,对于变革的力量的认识则从少数先进分子到广大民众,而对于变革的目标孙中山先生第一个喊出了“振兴中华”^④,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先声。孙中山先生更加伟大之处在于不仅为“振兴中华”奋斗终生,而且以自己丰富的学识和坚定的革命精神在斗争实践中推进着对于这一目标的认识。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建国方略”,乃至最后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版,第277页。

② 《落日的辉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2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④ 《檀香山兴中会章程》(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的三大政策,就是他留下的印迹。从他的奋斗目标中可以明确看到的不仅是革命,而且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建设的详细思考。他还满怀豪情憧憬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①

在诸多为中华民族前途命运进行探索的先进分子中,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是后起的一群。年少时他们许多人同孙中山一样曾经幻想过和平和改良的道路,但面对着积贫积弱、满目疮痍的旧中国,面对着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屠刀,面对着前辈们和自己不断奋斗探索 and 不断失败的教训,以及面对着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他们把目光投向了苏俄,投向了革命,投向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那里,看到了西方文明之精华——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的科学阐述;也看到了拯救中华民族的希望——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至此,一个朴实的道理呈现在中国人面前:落后就要挨打,要摆脱任人欺侮的状态,必须革除中国自己的弊端;无数的历史教训又都证实了改良的道路行不通,依靠少数先进分子起来革命也行不通;中国社会的积弊甚深,必须充分动员和组织广大民众,特别是工农大众起来革命,彻底推翻反动政权,改造旧社会,才能使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青春,才能走上独立富强不任人宰割的道路。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总结中国近现代历史经验时指出的:“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一切别的东西都试过了,都失败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奋斗方向,因为它们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紧紧地连接着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三座大山,赢得了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证明了社会主义可以救中国;而社会主义能不能发展中国,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最终实现民族的复兴,还要经过更为艰难的探索。

(二) 艰难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时期的艰难斗争,人所共知,其中尤以长征为最。长征的胜利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念的胜利,是在此信念下,共产党人坚强组织的胜利,同时也是毛泽东正确路线的胜利。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如何

^① 转引自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汇报》2016 年 11 月 12 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 2 版,第 1470—1471 页。

建设新中国、建设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这又是一个摆在共产党面前的难题,而且是个更为困难的题目。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就是看到了在十分贫穷落后的中国大地上,在帝国主义依然横行霸道到处扩张和欺侮弱小国家的情况下,要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是多么不易。

新中国六十多年建设历程,充满着艰难的探索。成功、失误乃至失败相互交织,几度曲折,又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深化着对于时代变迁的认识,深化着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认识的深化突出地表现在理念的深化更新上。理念的滞后和失误会导致工作方向上的错误,直接关系到建设事业的成败;理念的深化更新,反过来又会极大地推动着我们建设事业沿着正确方向顺利发展。六十年来最大的一次理念的转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虽然也不乏巨大的成就,但是1957年之后由于理念上出现了偏差,过分强调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存在,过分夸大了人的精神作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愈演愈烈,到了十年“文革”时期更是走向了极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晚年严重错误,由于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迷信,更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推波助澜,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引导下,一场动乱遍布神州,打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经济建设受到了巨大影响。惨痛的教训使人们清醒过来,中国共产党终于通过自身的健康力量,粉碎“四人帮”,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且鉴于对于世界形势新的判断,大胆地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解放思想,转变理念,促进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又一次大发展,这是后三十多年在社会经济乃至其他各个方面取得成就的直接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理念转变的最大亮点就是将市场经济拿来为社会主义所用。它是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颠覆,甚至也是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颠覆。在过去的理论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分,市场经济是个重要的标志。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共产党宣言》中高度肯定了市场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但是他们也十分尖锐地指出了市场的弊端:“劳动产品一旦作为商品来生产,就带上拜物教性质”,“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结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38页。